

史樹青 著

鑑古一得

九四寅頤廷龍

學苑出版社

鑑古一得

史樹青 著

顧廷龍題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鉴古一得 / 史树青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9
ISBN 7-5077-1824-7

I. 鉴... II. 史... III. 文物—鉴定—经验
IV. K8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3463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三河市印务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1/32 开本 10.25 印张 250 千字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3000 册 定价: 18.50 元



波斯萨珊朝人物银瓶
(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

唐文思院造鎏金朵带纹银香炉
(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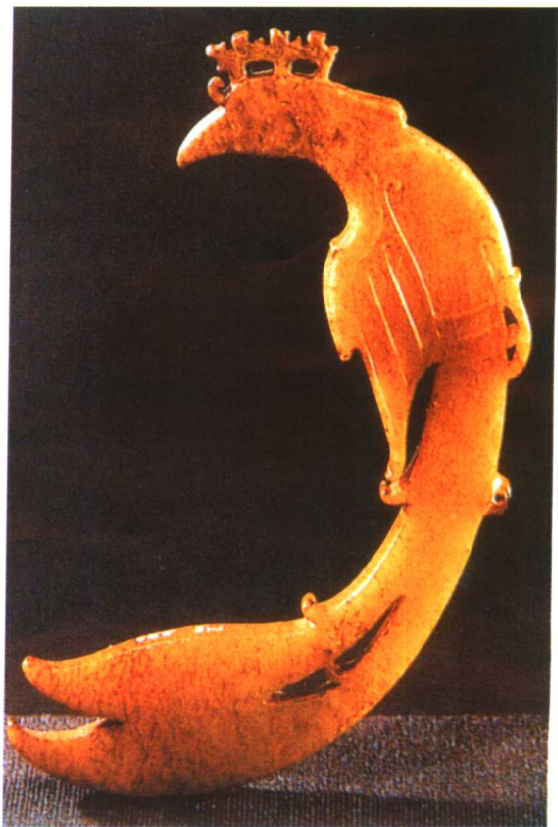
唐秘色窑瓷盘（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



唐鎏金花鸟纹挂链银香薰（西安何家村出土）



新石器时代陶猪（余姚河姆渡出土）



夏代玉凤（殷墟妇好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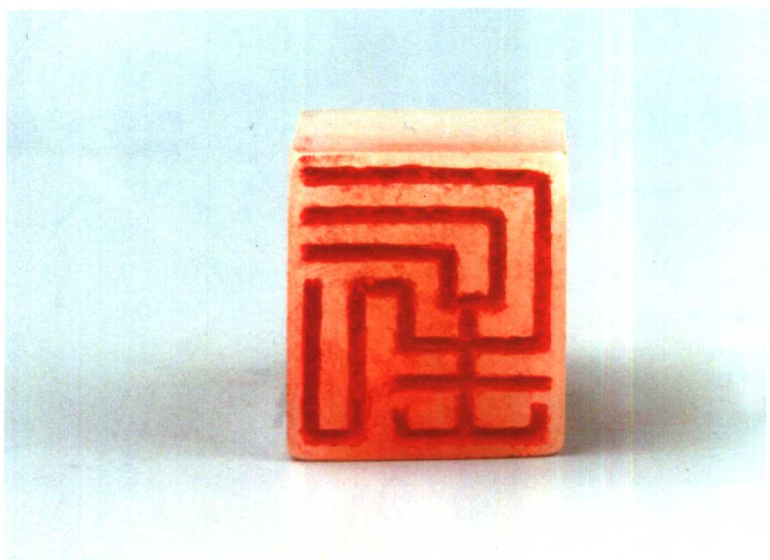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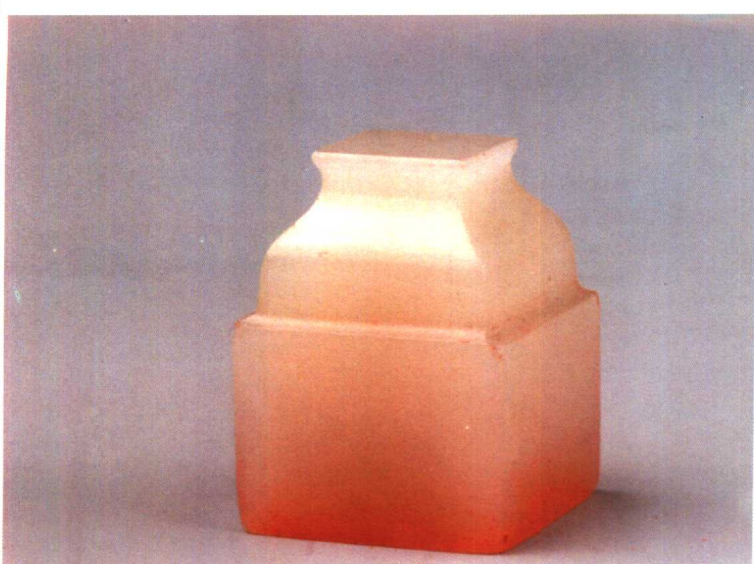
汉碧琉璃盃（罗马琉璃，广西贵县出土）



汉羊首形乌孙铜刀（新疆新源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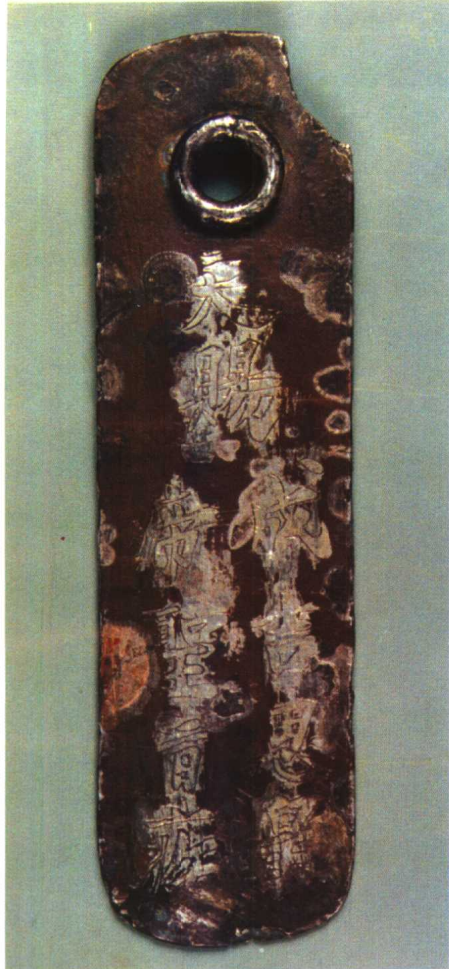


唐鎏金花鸟纹挂链银香薰内部（西安何家村出土）



宋白玉“封”字印

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
(正面)



(背面)



明王忬象牙腰牌（正面）



（背面）



序

史树青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常说文物鉴定不止是鉴定真伪,还要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文物与文献并重;眼学识别与科学分析并重;传世文物与考古发掘并重。鉴定的最高境界是“人弃我取,点石成金”。我国历史悠久,传世文物遗存甚富,史先生就是在中学读书时,从传世文物研究开始的。1947年史先生经业师余嘉锡推荐,到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至今在博物馆工作已有50多年了。

5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史先生总结了文博工作和文物鉴定工作的经验,认为博物馆藏品是业务活动和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亦是国家的珍贵文化遗产。首要任务是做好藏品的保管,达到制度健全,账册清楚,鉴定确切,编目详明,保管妥善,使用方便。至于藏品的鉴定,只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始,史先生是文物鉴定的通才,对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玉器乃至考古发掘品等等,都有涉猎。对书画、碑帖、古籍版本研究甚深。所鉴国内外公私收藏的文物数量达百万件之多,常谓学习文物鉴定,尤其是书画和古籍,要记住上万个古代作家和历史人物的姓名、籍贯和主要事迹,只有这样,在工作中才能游刃有余,而且要特别重视学者型的人物,妇女及少数民族尤为重要,这些人的作品反映时代精神更强,能够从多方面体现历史价值,因此在书画鉴定工作中提出了“书画征史”的论点,强调鉴定任何一件文物,都要以“历史价值第一,艺术价值第二”为原则。提倡紧密结合文献、史料,广收博取。反对以纯“艺

术价值”为标准的鉴定观点。历年以来由他慧眼鉴定过的文物精品不乏其数,尤令人瞩目的是孔望山石刻的研究。孔望山位于江苏连云港市,山崖上雕刻有百余尊石像,传说为孔子带领众弟子登山望海。史先生经过全面的考察研究,指出石刻内容不像是过去所说的孔子七十二弟子等古圣贤雕像,更不是俗说的“秦王乱点兵”,也不属于世俗内容的人物石刻,而是一处用汉代画像石雕刻技法,以佛教题材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宗教造像群,它的开凿年代为东汉时代,要早于敦煌石窟 200 年。此说经专家论证,认为它是我国佛教艺术的早期形式,也是我国佛教艺术的重要起点。它的发现,提出了佛教研究方面的许多新课题,对我国佛教史、艺术史和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孔望山佛教造像群,于 1988 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先生赴海南岛考察,在乐东县文化馆发现西汉“朱庐执判”银印,印为中央朝廷封赠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之官印,极为珍贵稀有,被誉为“海南第一古印”。

70 年代史先生友人、兰州苏继新先生将个人收藏的一批文物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面“重圈多角纹”铜镜,经史先生鉴定属四千多年前齐家文化之物。比 1975 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和 1977 年青海贵南尕马台发现的两面铜镜形体要大,是三面齐家文化铜镜中最精美者,就其图案设计,铸造工艺而言,是非常罕见的。为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在中国冶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晋咸宁四年吕氏碑》,书体在隶草之间,为有年月的书法标准,原物经史先生访得,捶拓行世,为我国书法研究增添了新的史料。

《北京沮渠安周造寺碑》拓本,原碑刻于北凉承平四年(445 年)。清光绪年间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德国人偷运出国,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端方随考察宪政大臣出访欧洲,见到此碑,遂亲拓二本,

其中一本为全拓,另一本仅拓了四分之一,携之归国,遍征海内外人士题跋。碑石于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此拓之所以珍贵,从历史上看,为我们提供了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同汉族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填补了北凉沮渠氏政权时期的文字历史空白。从汉字的演变史上看,展示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脉络。1976年经史先生友人李章汉先生,将此拓本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自此这一孤本,成为本馆文物藏品中的瑰宝。

成吉思汗传世的画像,过去仅见一幅,为明人依照旧本摹绘,见于清宫南薰殿旧藏《元代帝王册》和《石渠宝笈》、《南宫殿图像考》、《中国历代帝后像》等书中。1953年史先生从陈宦的后人陈仁恪先生处,征集到一幅成吉思汗半身像。此画像纸本设色,成吉思汗头戴外白内黑的皮冠,身着浅米色毛绒衫,面赭赤色,额前有发微露,冠下耳后垂鬟。据陈氏说:“此像为陈宦任民国政府参谋次长,到蒙古视察时,蒙古贵族所赠。”鉴定此影像时,有人从题签的字体和纸张上判断,认为是明代摹本。还有人认为是清代画工从南薰殿旧藏本摹绘下来的。但经史老和书画鉴定小组张珩、谢稚柳等诸先生考订,一致认为从画的质地、墨色、人物形象、用笔等方面看,应是一幅元人作品。其绘制年代不一定是在元太祖生前,但距太祖逝世不会太远。画中人物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记载相吻合,是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又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为蒙古国建立时期的重要实物,先生坚持己见,千方百计征归中国历史博物馆,充实了多年陈列中缺乏成吉思汗实物的不足。

《赵孟頫致张景亮书札》是史老为博物馆征集的又一件珍品。1981年中央民族大学贾敬颜教授,请史先生鉴定其收藏品,当看到此书札时,先生认定为赵氏真迹,旧为陈庆和“三鸥波馆”藏品。后贾先生将此札捐赠本馆。书札字体流畅,意追山阴,是赵氏晚年佳作。

1998年史先生在青岛休养时,不忘调查文物市场,在一处旧货店中为馆收得汉代琉璃器数种。其中大小蜻蜓眼二十八枚,卷发络腮胡须人琉璃坠子二件,无下巴人头坠子二件,白琉璃瓶一件。这批文物为研究中外关系史具有重大作用。

先生不仅为国家广收文物精品,而且还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藏品,如汉铜熨斗、隋大业六年铜佛造像、唐三彩圆盘等文物捐献给国家。其中清代邱逢甲《行书诗轴》,是先生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时,偶于春节厂甸画棚中购得的。邱逢甲为清末爱国将领,台湾人,光绪十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曾参与义军抗击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其书法作品流传甚少,极富历史价值。

史老考察文物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还曾应邀访问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泰国等国家。他非常重视同国外友人的文化交流,1997年他在东京美术综合研究所讲学时,发现了我国明代末年戴笠的一幅书法作品,国内稀有,回国后对此珍贵文物撰文介绍。先生老友日本东京淑德大学教授西林昭一先生见文章后,于1998年将自己珍藏的戴笠行书诗轴,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戴笠是明末渡海赴日本后为僧的,法号独立。他除了传播中国的文学艺术外,还行医济世,被日人称为神医。其书法作品,国内仅见于史料记载。西林先生捐赠的戴笠作品,不仅使我们欣赏到其遗墨,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对历史的珍视,从中也可以看到史老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倾注着极大的热忱。

史先生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坚实的文化基础,先后撰写了《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书画鉴真》,合著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中国文物精华大全》,主编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捐赠文物集萃》及《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等书。先生乐于奖掖后进,教人认真读书,在博物馆工作要

不断丰富、充实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多多接触实物,于实践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矛盾,以利于博物馆工作的向前发展。

今先生袁集近年所作论文为《鉴古一得》。盖其自幼读书,慕琉璃厂“一得阁”之店名。稍长探源《晏子春秋》,始知“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之名言。《鉴古一得》即其读书为学,文物鉴定所获一得之见,传告于人,谅为先生著书之本意也。

二〇〇一年二月后学海国林拜序

目 录

古器物学

《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金银玉石卷》序	3
商无斂鼎的发现及其意义	18
西周蔡侯鼎铭释文	23
论蔡侯墓的年代	28
对“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中几件铜器的看法	33
“陆离”新解	38
《石鼓文新解》序	44
关于“桥形币”	49
西汉朱庐执刂银印小考	55
《古玉研究文选》序	57
漆林识小录	60
漫谈新疆发现的汉代丝绸	71
汉代独轮车	77
古代科技事物三考	80
唐代宫廷精品荟萃	92
波斯萨珊朝鎏金人物银瓶	96
忽雷为胴族乐器说	97
唐代“胡腾舞”铜人像	100